

## 卷一 论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合经济，这种经济实际上是由“两只手”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的：一是政府这只主观的手，“看得见的手”；二是市场这只客观的手，“看不见的手。”“两只手”各怀绝技，竞相为用，对经济起着调节和推动作用，体现在竞合经济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指向和“路径依赖”。



## § 1 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20 年来确立市场经济体系，我们要进行历史回眸。在过渡中“双轨制”的“看得见手”到“看不见手”，使我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视，“开弓没有回头箭”

### 第一节 确立市场经济的历史回眸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那么，市场经济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其发展的历史过程怎样，形成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是怎样提出的，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理清。

#### 一、市场经济之“源”

“市场”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和中世纪，只要有交换就有商品、就有市场，但是有“市场”并不等于有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时代，大部分产品是自给自足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通过“墟”或“市”等小商品市场获得，作为社会资源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土地等都不是通过市场进行配置的，而是通过超经济的或非经济方式配置的，大都没有纳入商品化范畴，市场不过是整

个经济生活一个很小的补充。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不可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市场经济在西方的率先出现，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新航路的开辟，迅速扩大了欧洲市场，使欧洲市场逐步国际化，社会资源从而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流动。

第二，英、荷等国机器生产的出现，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即工业迅速从农业社会中分离，商业又从工业中独立出来。分工范围的扩大以及内部分工的越来越细，导致人们离开交换、离开市场就无法生存，市场的影响和范围越来越大，以致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第三，由工厂雇佣制度和圈地运动带动的是生产要素市场化。雇佣制度导致劳动的商品化，圈地运动的直接结果是大批农民离开了土地而成为雇佣劳动者，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圈地运动也开始了土地商品化市场化进程。

第四，通过欧洲的“价格革命”，逐步使价格成为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信号。

第五，与自然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细胞是家庭不同的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经济细胞是企业工厂。家庭生产是为自己，而企业生产是为社会。因此，反映社会需求的市场需求就成为企业生产的第一动力。正是从西方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中，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逐步提出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理。亚当·斯密的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资源配置理论的基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在“自然秩序”下，每个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

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人是理性的，是专为自己打算的。如果任凭每个人都追求其自我利益，他同时也就促进了社会利益。政府不当于干预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而应当遵循一种自由放任政策。亚当·斯密天才地猜测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对如何实现资源配置却缺乏具体说明。当马克思在谈到社会劳动资源可以用于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数量界限是由价值规律决定时，已经触及到了资源配置问题的症结。

“市场经济”一词产生的时间远远落后于它的实践，是在 19 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兴起后才流行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 (A. Marshall)、瓦尔拉 (L. Walras)、帕累托 (U. Pareto) 重点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运用数学工具，对市场机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精确的分析。根据他们确认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着市场上的各种力量，企业能以最低的成本组织生产并得到最大利润，消费者能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要素所有者能按照所作贡献的大小得到各自应得的报酬，从而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使整个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只有到新古典经济学派这里，市场经济理论才获得现代意义上的经典定义。

## 二、市场经济之“流”

与古典市场经济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在 20 世纪的发展，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两大根本性特征：第一，产权市场化；第二，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现代混合型市场经济开始占主导地位。产权市场化的根本标志是 20 世纪股份公司的发展和健全、完善的证券市场、产权市场的形成。

开放的、市场化的产权制度改变了古典时期所有者、经营者合一，所有者直接支配、使用自己财产的制度，实现了支配与使用或经营权与所有者的分离。这种分离普遍化和深化的结果，便是财产无论归谁所有，都可以为社会所支配和使用，即人们可以凭借其才能去获得对财产的经营和使用权。财产（资本）所有者获得产权转让价格和产权收入的权利，经营者支付产权价格，获得经营收入，竞争造成使用的机会平等，产权价格就像产品价格和劳动价格那样成为一种机制，即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产权社会化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制度的深层变更，即古典时期开始产生的股份制企业在 20 世纪的普遍发展。20 世纪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深刻变化，是从早期自发的、自由放任式的古典型市场经济向现代的掺和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混合型市场经济的发展。

古典型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示出市场非“万能”和自身的缺陷来：第一，市场不能消除垄断。生产的集中和企业的联合可能产生垄断力量，凭借其规模经济优势控制产量、提高价格，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垄断将会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第二，市场不能消除过度投机的负面作用。投机对市场经济来说，是一种有利有弊的行为，投机的负面作用会加剧市场波动和经济的不稳定。第三，市场存在着反应滞后、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往往影响企业有效地配置资源。第四，市场价格反映不出长期发展的动态效果，亦即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缺陷。第五，市场机制不能保证经济运行的总量平衡，市场难以全面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更不能实现特殊的社会发展目标，如充分就业和减少贫困等问题。正如马克思曾经提示的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的个别企业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的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

但是，西方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日臻完善，不断地克服早期市场那种盲目自发的无政府状态，完全放任自由的缺点，建立了某些修正机制。19世纪末期产生的托拉斯组织、联合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开始加大了计划性和预测性。但是真正开始从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带有宏观调控的混合型市场经济迈出关键一步的，是从凯恩斯学说和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凯恩斯学说的实践和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使混合型市场经济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成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荷兰与北欧诸国的主导经济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在战后获得迅速发展。

### 三、西方市场经济主要模式

由于各国发展的进程不同，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认为，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有三种主要模式，即：美国的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或称自由市场经济；法国、日本的行政管理导向型市场经济；德国和北欧诸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现介绍几个主要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战后出现的西方混合型市场经济是对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与北欧诸国的经济模式的总体概括。

**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亦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特点是：

(1) 承认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作用，但不赞成国家计划。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美国政府不仅采用财政、货币、税收等政策对市场进行调节，而且还直接作为消费者，通过其购买行为和“购买政策”进行消费导向，以此影响产业和企业发展方向。(2) 以垄断资本为基础又坚持“反垄断”。一方面，美国经济的垄断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完全竞争能够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政府保护竞争，确保竞争性企业占

大多数，反对垄断企业之间订立价格协定，创造一种尽可能充分竞争的环境。（3）比较强调各经济主体的独立性，有规则竞争和较少政府干预，法律成为处理经济关系的唯一准绳，政策只着眼于短期的需求调节。

**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亦称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是一种既摒弃完全自由放任又避免国家集中管制经济的弊端，把个人自主决策的自由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的模式。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有限干预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内容：一是社会总产值中的一部分归雇员所有，雇员对企业的生产与管理享有“共同决定权”和“参与决定权”；二是扩展社会保障事业，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国家的主导作用表现在：重视企业家的作用，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种种条件，通过限制垄断发展、取消约束性的经营惯例、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向真正需要社会福利的人提供社会福利、放宽对外贸易的限制、实行健全的货币制度、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等政策和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亦称“政府主导型”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奉行的基本原则是：（1）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2）契约自由；（3）自我负责。基本特征是：私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虽然要按市场经济原则对资源作出决策，任这种决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包含了政府的“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诱导因素。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编制长、中、短期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府引导企业行为，形成了公私合作或官民协调，政府选择和扶植重点行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在私人手里，实行所谓“计划导向型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与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更为纯粹的市场经济相比，有三点差别：一是消费的个人的决策作用在整个经济体制中的作用较小；二是在企业决策体制中，大企业处主导地

位，企业决策权不是控制在股东手里，而是更多掌握在企业最高经营者手中；三是宏观决策的主体是政府，议会的作用十分有限。

从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和与当代几种经济模式的比较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产品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和产权市场化后而产生的逐步完善的，它的根本含义就在于它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手段。

第二，市场调节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手段，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那些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则导致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这种对比，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腾飞。

第三，古典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到当代，无一例外地都引入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某些手段，只是由于侧重点不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即使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也对土地、城市公共事业等方面采取调控或半干预形式，也对城市发展编制了规划和长远发展战略。也就是说，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在当代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美国经济学家缪尔森所说的“混合型”市场经济道路，尽管有所谓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出现，那种完全排斥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

第四，当代混合型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有的侧重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有的侧重于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指导性计划，有的采取国民收入再分配方式，有的采取政府积极的干预形式，各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过程中，根据我们的国情，择

善而从，吸收消化，从而创造一种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脉络

对以往计划体制的弊端，我们党在很早就有所认识。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曾提出，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商品生产的范围不仅是生活资料，有些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属于商品生产，即使全部实行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某些地方也要保留商品交换。他还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计划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看待商品经济，在实践中缺乏一惯性，尽管他也承认商品经济的作用，不过，他只是在把商品经济或价值规律仅仅当作计划经济的补充或一种计算工具时才承认其作用。晚年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基础，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左”的思想日益泛滥，甚至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当作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横加批判，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从理论上对如何消除以往计划体制的弊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有效的探索。

1979 年 4 月，在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的提法是：“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与此同时，理论界坚冰打破、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中，开始探讨“社会主义经济

中价值规律问题”。1979年4月在无锡市召开的有300多名学者参加的全国大型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应该互相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经济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的市场经济”。这一提法在当时并没有被多数人接受，甚至遭到某些人的质疑，但这活跃了大家的思想，激发起人们对新的经济模式的思考。1979年春开始酝酿确立的这一思路，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个提法，实际上是1979年至1984年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主导思想。它与原来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个历史性飞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示出“一包就灵”，逐步在全国农村推行开来。乡镇企业和个体、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显示出商品经济的活力。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民经济相对严重缺乏活力，这使不少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之所以难以改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改革滞后，而增强国营企业素质的必由之路，在于使它们成为独立的商品经营者。1984年夏秋之际，一些经济学家向中央提出，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十二届三中全会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消除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就确立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经过几年的实践，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在全党进一步确立的新提法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市场经济，由于是公有制为主

体，实行按劳分配，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也更有效地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可以尽量减少盲目性。”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第一次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这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

### 五、经济改革的“驱动轴”

我国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上的最大失误，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价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长期以来，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由于否定了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否定了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因而形成了一个僵化的经济体制，使整个社会生产将按照代表社会的中央计划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来进行。（1）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府统管一切，政企合一，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国营企业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使地方及企业缺乏主动性，从而打击了地方与企业的生产积极性。（2）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靠行政的命令机制来配置，靠计划调拨，靠无偿使用等方法来配置资源，造成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3）经济信息的传递是纵向的，由上至下的，其信号是指令性的行政信号，割断了经济运行内部众多的横向市场联系。因此，旧体制的最大特征是否定商品经济，否定市场，否定价值规律。

改革 20 多年来，实际上是以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为主线的。无论是最初始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是所有制改革，还是价格改革，其核心都是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发展市场体系，提高商品化和市场化的程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走向市场化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不断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明确目标，而且能够采取巧妙的方法，坚定不移的向这一目标推进。事实证明，尽管改革中有许多阻力和干扰，但是商品经济和市场力量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滞的历史潮流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轴。市场的因素已经在原有的计划经济缝隙和边缘地带茁壮成长起来，使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越过了原有临界点，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1）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引进了市场机制，市场范围逐步扩大，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2）打破了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发展了商品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市场体系得到初步的发展，市场结构初步完善；（3）放开了价格管制，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调节，使市场机制起到较大的作用；（4）发展了经济运行中纵横交错的、多种多样的市场联系，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凡是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实力就比较强，发展势态也比较好，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起来的农村改革和由对外开放激发出来的城镇经济活力，都无一不是市场的调节作用使其繁荣。因此，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就已指出的：“改革中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应该是统一的、竞争的 and 开放的。”已经公布的中共

十四大报告更加明确的提出：“我国经济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目前在我国现实经济中有两个并存的部门：一个极富生机活力，它主要由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成长起来的非国有经济组织，而大多数国营企业由于仍处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层层控制下，经营机制没有根本改变，因而显得缺乏活力。两个部分不同绩效的鲜明对比，无可辩驳地证明：没有 10 年卓有成效的市场取向改革，就不会有我国今天的经济繁荣。只有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才能为整个经济腾飞打下基础。由此可见，发展市场经济，是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驱力。而研究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找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特点与规律，正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促进生产和及时协调需要，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大市场。

## 第二节 转轨中的问题及制度设计

经过 20 年翻天覆地的经济改革实践，中国已经踏在市场经济的门槛上。中国能否彻底转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究竟怎样？运用竞合经济的路径依赖进行努力探索与实践是必要的。

## 一、转轨中的问题

纵观世界历史，改革无非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法律或政府命令强制性地修改制度，实行制度创新；二是通过部分人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导致旧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在我国来说，这些年的改革是两种方式的结合政府用第种方式发动了改革，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开始了规模日益扩大的自发私有化进程。

中国经济改革 20 年转轨过程中，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与国际上和苏联东欧相反，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路子。当时的设想是，走这样的一条路子，可以避免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由于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会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候却深深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人士。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即政治经济学，去建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梳理。

所谓转轨期的中国经济问题，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转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部因素，它要揭示的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和物之间关系变化的实质，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问题。

1. 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在转轨期由于权力这个严重变形的手在进行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所谓分配不公，其实不是体现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不公，而主要是资源分配的不公。目前这种财富占有格局的形成，归根结底，不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而由于资源的分配、

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2. 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避开国有资产这一辆旧车，另外造了一辆新车，即发展了私有、民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份，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处于不断流失当中。前 17 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担，先吃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本，后借外债内债。可以说，在 80 年代及 90 年代最初一两年，全体中国人在吃计划经济老本时，或多或少都得到利益。但问题是转轨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有严重缺陷。

3. 保障制度建立，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组中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往那种行政性的计划分配就业制度造成了国有单位严重的过度就业，国家现在每年用于 2000 余万企业富余人员的支出约需 2000 亿元人民币。由于其它所有制的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有裁汰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许多人都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视作突破口。

在短短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并不像当初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如果总体平均收入水平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一、二次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上述问题容易引起种种社会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因为一个靠勤劳致富，另一个靠投机，就其金钱来

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是一样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依靠制度约束，也还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此外还有一些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怎样才能释放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有关就业与犯罪的关系问题等等，可以说政府今后若干年内制定的各项经济改革都必须考虑就业含义，否则任何“严打”活动都难以奏效。在 1996 年 7 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已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但无论是人口问题，还是环境问题，都不是单纯的通过中央政府行为就可以取得成效的，而是要全社会的参与行动。

改革之初，一项小小的放权让利都会获得成倍效益，而现在人们却面对着改革边际日益收缩的现实，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改革的基本态度。所以对我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每项改革措施出台之前的政治约束，而是事后的不良反应。期望用市场手段来解决非市场原因引起的种种问题，困难是很多的。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的经济学问题，二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建立中国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中国目前处在由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恰恰是在对掌握国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必须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 二、转轨中的制度设计

克服社会转轨期的震荡，是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根据现代化理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